

孙中山人口思想再研究

张智敏 吴中齐

【提要】 孙中山人口思想从形成与发展的一般线索看,经历了由“患多”到“患少”的转折;对其“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逻辑分析,则可看出它的实质是既“患多”又“患少”的辩证数量观。他对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地域分布,控制人口的社会构成也有较多的论述,作者主张按照孙中山“患多”、“患少”、“三民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去理解其人口思想精义及科学体系,才能真正有所裨益。

【作者】 张智敏 湖北大学人口学系,讲师;吴中齐 湖北大学人口学系,讲师。

自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谢世之后,学术界、政界人士对他的思想、学说的研究遍及各个方面。对他人口思想的研究,也有许多论文、专著刊布。笔者读孙中山先生文集,并考察以往的研究之后认为,作为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不唯一生都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其思想建筑在对当时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准确把握上。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他的人口思想予以再认识、再研究,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故聊举其荦荦数端,商诸同好。

1. 孙中山人口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线索

孙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散见于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撰写的专著、演讲及各种函电、谈话文件中。据1985年台湾版《国父全集》(这是目前最齐全的本子)以及与之有关史料考证,其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1.1 早期“患多”的人口思想

孙中山先生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广东省原香山县(现中山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目睹了广大农民的悲惨生活,深知民间疾苦,并痛恨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无能。他在广东、香港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并有了初步的社会阅历之后,于1894年6月,在《上李鸿章陈救国大计书》中疾呼:“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①这是中山先生早期“患多”人口思想的典型例证。他认为,当时官无其事,农无其田,工无其业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口增殖太快所致。促成孙中山先生这种人口思想的直接因素是清代时期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的现实。据史料记载,1741年(乾隆六年),中国人口为14341万,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五年),中国人口总数已增至41281万^②。百年之中,中国人口

^① 《国父全集》,第二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函电:第7页(本文引用孙中山先生的原话,一般以中国大陆地区有关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出处,如果与《国父全集》1985年版有不同的,以《国父全集》为准)。

^② 《中国人口变化略表》,《中国人口报》,1995年7月第三版(据《中国人口变化略表》统计:1840年以后到1924年八十四年间,中国人口已出现下降的现象)。

增长了两倍,以至人多地少,米价昂贵,民食日艰,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认为,孙中山早期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与近代人口思想家洪亮吉(1746~1809年)、汪世铎(1814~1889年)的人口思想有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之点。其相同之处在于,对旧中国的人口过多、增殖过快的认识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山先生不仅认识到“人满为患”的问题,而且针对当时中国政治、军事、工业、农业、商业等诸方面落后的状况,全方位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学习西方技术,洋为中用的开放思想。笔者认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山先生的“患多”思想是富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的,早期的这一忧患意识虽不能代表孙中山系统的人口思想,但它是孙中山先生人口思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 后期“患少”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

与前“患多”的人口思想相反,孙中山先生其后更多地表述了他“患少”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1924年,中山先生在广州演讲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时曾指出:“我们现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来比较一比较:近百年之内,在美国增加十倍,英国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国是四倍,德国两倍半,法国是四分之一。”而在中国,“还是四万万”,并且说:“各国人口的增加数和中国人口比较,我觉得毛骨耸然……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是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的民族所消化,还要灭种。”^①这是孙中山先生对自己“患少”的民族主义人口思想的典型表述。怎样理解这一表述呢?

首先,应从本世纪早期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和革命思想的角度来观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全国各界都激起了一股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作为这场革命的思想指导者和实际领导者的中山先生,个性及思想都具有矛盾的两面性。他这一时期的人口思想也是如此。一方面,他“坚信尽管目前中国的地位卑屈,但中国以她四亿多人口,必将确定她的权力并获得强权的地位”;“他对自己能运用策略,击败任何对手,和对任何情况均能深切明了,具有至高的信心”^②。并且“肯定中国人的团体优越性”,期望并相信中国能早日恢复强国的地位,与欧美并驾齐驱。一次,中山先生和英国领事在谈到中国的实力问题时曾说:“日本的人口和富源不及中国甚远,如果依你今天所说的办法,我们中国参加你们一方面,中国不到十年,便可以变成日本,照中国人口与领土之大,中国至少可以变成十个日本”^③。这里孙中山先生把人口数量的众多看作是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所以不复患其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世界形势恶化,“中国人惧怕外国的征服或是瓜分”;“对外国之崛起力量所产生的恐惧与愤怒,是中国政治情绪的重心所在”^④。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山先生说:“自古以来,民族之所以兴亡,是由于人口增减的原因很多,此为天然力淘汰”^⑤;又说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所以中国现在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⑥。出于这样的民族忧患意识,中山先生在人口问题上由“患多”转向“患

① 《国父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

② 李国祁:《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台湾时报出版公司,1970年版,第310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5页。

④ 同②。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0页。

⑥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少”也是必然的。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上述原因，便完全抹杀中山先生这一时期人口思想在学理上的背景和价值。公正地说，中山先生这时“患少”人口思想的提出，是有其理论上的针对性的，这便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随同庸俗社会达尔文主义由于严复等人的译介，在社会上影响甚巨。中山先生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持严正的批判态度。早在1912年的演讲中，他就说：“英格物家马耳国（即马尔萨斯）者，著有《人类物产统计表》一书，其主脑谓物产之产额，有一定之限制，而人类之蕃息，为级数之增加，据二十五年一倍之说，推之将来，必有人多地少之患。生众食寡，天降疫疠，国际战争，所以减少人口之众，防止孳生之害，而合于世界演进之原理”^①。1924年，中山先生在演讲《三民主义》时，又一次提到马尔萨斯的学说。他说：“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不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当时中国的一些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所以孙中山先生反其道而行，大力倡导增殖人口。这固然有其矫枉过正的地方，但应注意，中山先生当时引以为据的中国人口数量是3.1亿；还应明了，人口学所要研究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口多了好”还是“人口少了好”这么个问题。对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我们也不能仅仅纠缠于少和多的问题上去研究。否则，从研究方法上就不免犯断章取义、形而上学的错误，也无法全面领会中山先生人口思想的精义及其逻辑关系。

2. 孙中山人口思想的逻辑体系

“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以思想和概念的形式来把握自己的对象”^②。中山先生是极具科学精神的思想家，虽然他对人口问题的讨论不像一般学究那样喜欢在概念上咬文嚼字，但他的人口思想是有清晰的逻辑思路和层次观念的。这从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到证实。

2.1 双重忧患意识的辩证人口数量观

如前所述，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经历过一个由“患多”到“患少”的转折，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在倡导三民主义的过程中，他对中国人口问题有更深刻、更彻底的认识。他在论述“民生”问题时指出：“吃饭问题是常常做惯了的事，为什么一件很容易又是做惯的事还有问题呢？殊不知吃饭问题就是一项顶重要的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国家之生死存亡的”^③；“全国人民现在还不够饭吃，每年饿死的人数，大概有千万，这还是平时估算数，如果遇到水旱天灾的时候，饿死的人就不止千万了”^④。可食物来自土地，人口过多，生产力又相当落后，就与有限的耕地发生矛盾，这里孙中山先生实际上论述了人口与生存土地的关系。人口与土地都是国家存在的生态基础，但是二者也可能是矛盾的，就当时中国而论，中山先生实际指出了人口与土地关系中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

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五年中，中山先生面对中国四万万人口，面对列强的环伺侵夺，对人口与国力、人口与消费的认识是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一方面，中国人口多，这是国家实力的表现之一，为了抵御外侮，人口需要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增长过多也会给人们的衣、食、

①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1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6页。

③ 《国父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

④ 同③。

住、行带来巨大困难。他说：“我们现在要解决民生问题，不是解决安逸问题，也不是解决奢侈问题，只是解决需要问题，这个需要就是要全国四万万人都可以得到衣食的需要，要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山先生从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两个方面立论，既看到了人口多的正面作用，也看到了人口多的负面效应。故此说，这时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有了双重性——既“患多”又“患少”；同时也有了辩证性。对人口之“多”或“少”都有弊有利这一点，他的认识是很清楚的，既不像梁启超那样盲目乐观，也不像严复晚年那么悲观。

2.2 人口的数量与质量观

中山先生一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在当时中国财力较弱，科技落后，民智未开的情况下，他感到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认为，中国“所受的祸害详细说：一是受政治的压迫，二是受经济的压迫，三是受到列强人口增加的压迫”^②。在政治、经济、人口三者之中，人口作为社会的生态基础，作为民族兴衰的重要标志，当然是最具基础性的。中山先生主张增殖人口并不是主张人口的单方面增长，而是应当和中国的经济力、政治力一同增长。也不是单指人口数量上的增加，相反他更重视人口的质量。

对于当时的中国，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又说：“中国受到列强欺侮并不在船不坚，炮不利”，而在于人口素质差^③。他认为：“我们今天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精神”^④。也就是说，只有四万万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去学欧美之所长，方能和欧美并驾齐驱。那么怎样才能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呢？领导中国的责任首先促使他进入历史领域去思考。对于中国固有的能力，中山先生作了充分的估价。他认为，中国以前处在世界强国的地位，中国人的能力“要比外国人大得多”；“现在要恢复固有的地位，便先要把我们固有的能力一齐都恢复起来”^⑤。为了这个民族主义目的的实现，就必须实现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权是全体中华民众的民权，而这种民权既要体现民族的精神，又要以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为前提。中山先生深信，在一个开放的中国，在三民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使中国民众成为有文化、有教养、体魄健康、掌握科学的民众，中华民族一定能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2.3 人口地域分布和贫富构成问题

中山先生的人口结构观以“民生”思想为基线，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对人口分布结构有大量的论述。他主张通过“移民垦殖”，调节中国东南人口稠密，西北地区人口稀疏，分布很不平衡的状况。他讲道：“货之弃于地，必荒僻为多，荒僻之足以移民，为世界公认。生齿之繁，至吾国而极矣……吾有天然固有之殖民地，置而不经营，则以患贫之国，又自重过庶之困，乃所谓大愚不灵者也”^⑥。中山先生认为，人口分布不均匀会加剧人口过密和过疏状况，从而使国穷民困。在精心编制的《实业计划》中，他强调：“以国民需要之原则衡之，则移民实为今日急需中之大者乎”^⑦。他认为，“假定十年之内，移民之数为一千万，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0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8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1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9页。

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8页。

⑥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4～385页。

⑦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01页。

大”^①。通过移民，“垦发富源”，可以使稠密地区的无业游民有工可做，又可以使地广人稀的地区得到资源和商业的开发。中山先生认为，有计划有组织地做好“移民垦殖”之事，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防巩固的千秋大业。故此，他在《实业计划》中规定：“敷设铁路七千英里于此境域，以为建筑北方大港之目的”^②。

第二，是对当时中国人口贫富构成的论述。中山先生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农业立国”。当时农民在全国人口的构成中“是占大多数，至少有八九成”^③。既然主要是农业国，就应该面对这一事实，“先天下忧衣与食”。所以中山先生认为，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和人口关系最密切的。“因为没有饭吃，所以已生的人民要死亡，未生的人民要减少”^④。在中国土地面积较大、农业产出“尽有发达之余地”的情况下，中山先生认为要解决人民吃饭和穿衣的问题，首先要解放农民平均地权；其次是改良人口地域分布状况和生产方法；再次则是要保护并发展民族工商业。在涉及到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时，中山先生承认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资本家的剥削，正如他注意到农民受地主盘剥“不高兴去耕田”一样。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正对整个中国进行政治欺压、经济掠夺的时候，中山先生认为，全中国人都受到了异族的侵夺，“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⑤。为了预防“特殊阶级”的出现和劳资之间的激烈对抗，中山先生主张实行“节制私人资本”，“制造国家资本”的办法，从而有效地控制国民的贫富构成。从台湾省近 50 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看，正是这个思路。实践证明，中山先生的人口构成论，甚至整个三民主义体系，虽然不是完全、唯一正确的，但至少是现实有效并富于启迪意义的。对中山先生整个的人口思想体系，我们整体上亦作如是观。

3. 孙中山人口思想对人口研究的意义

在对中山先生人口思想的发展线索与精义及逻辑体系做了归纳之后，不禁要问：中山先生的人口思想中到底有哪些观点对今天的研究有启迪意义？我们认为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既“患少”又“患多”的辩证人口数量观，对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国情中的人口问题是有所启发的。本世纪最初二十五年中，中山先生“患少”的人口观点占主流；而当今中国以“患多”为主流。中山先生言少深知少之害，我们今天言多是否辩证地认识到多之益处呢？我们并不否认人口之多寡在一定条件下有一个合理的“度”，但是多既然是实情，不能回避，我们又何必把人口之多简单地斥为“包袱”呢？中山先生人口思想由“患多”转折为“患少”的历史线索提醒我们，人口作为社会大系统之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和社会其它系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口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大系统之中从多方面综合着手，不能单独强调人口数量的增与减或多与寡。

第二，坚持民族主义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业建设与心理建设相结合，民生幸福与民权享受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综合解决人口的诸多难题。中山先生一生奔走呼号，力行革命，都是为了“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⑥。但是，他坚决反对固步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第 201 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331 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849 页。

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861 页。

⑤ 《国父全集》，第一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年版。

⑥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678 页。

(下转第 38 页)

此外，加大劳动力流动成本并不能阻止流动发生，却对流动者进行了选择。也就是说，由于最贫困的人口支付不起这种高昂的迁移成本，城市政府所采取的歧视性政策，恰恰是把那些真正贫困从而也更加需要转移的农民拒之门外。因此，这种排斥贫困人口进城打工的做法，显然是与国家扶贫战略中的东西互助精神不相协调的。

参 考 文 献

1. 张茂林：《中国贫困人口的资源生态空间特征与开发性扶贫移民》，《人口与经济》，1996（4）。
2. 朱玲：《转轨时期的中国扶贫行动》，中印城市发展挑战研讨会论文。
3. Lin, Justin Yifu,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
4. Riskin, Carl, 1994, Chinese Rural Poverty: Marginalized or Dispersed?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5. Riskin, Mehta, Zhong, and Cai, 1996,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n Assessment and Recommendation, report prepared for UNDP.
6. UNDP, 1997,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上接第 53 页）

自封，反对搞闭关锁国，而是主张走民族主义与对外开放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国家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其背景、认识与中山先生当时有所不同。但作为“革命先行者”中山先生的思想，可供我们借鉴、采纳的地方还很多。“譬如，学科学，迎头赶上去，便可以减少两百多年的光阴”^①。中山先生说过，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中国确实经历了屈辱、贫弱的痛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人民生活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但与发达国家比，仍然有很大差距。中山先生加速发展的思想，启示我们，既要看到发展也要承认差距，否则还会落后，还会挨打。中山先生又主张“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从而恢复“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②。今天人们惊呼，中国的传统文化断层了，中国人失掉了中国的“道”和中国的“心”，要把业已消泯的人文精神重振起来。另外，中山先生是较早提出“人均”观念的。他曾指出：“按工业发达之国，其年中出息，以全国人口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百元，而中国按全国人口男女老少通计，每年每人可得七、八元耳”^③。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无疑较当时发达多了，但是与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仍很明显，这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教育和科学的普及有很大关系。联系到中山先生关于提高人口素质、民生幸福和民权享受的论述越使我们明白，多寡不等的人口数量即使从人口学中科学的“人口”概念来理解，也只是其底层的涵义而已。现实社会中，人口问题的真正解决，实有赖于经济的增长、教育的普及和民主政治的渐次发达，等等。

（本文责任编辑：徐培英）

①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0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7页。

③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4页。